

情绪化的台湾政治及其影响*

沈惠平

〔内容提要〕一般认为，民粹主义是台湾政治的基本特征。事实上，民粹主义背后是情绪在起作用，或者说民粹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情绪，民粹化是一定的社会情绪的反映。因此情绪化是台湾政治的主要特征，或曰情绪化的台湾政治。首先，情绪化的台湾政治由台湾政治舞台、政治人物及普通民众的情绪化三方面构成。其次，情绪化的台湾政治主要表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政党恶斗、台湾选民的情绪化对立及整体社会的集体焦虑症。深究起来，三大因素使然，即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上的严重分歧与对立、台湾社会缺乏民主政治所必备的“公民文化”与素养，以及台湾“选举社会”无止境的竞选活动。最后，情绪化将导致台湾政治的激进化、台湾社会民粹化甚或台湾自我解体，以及两岸的情绪对立甚至对抗。台湾情绪化政治的应对之道，则包括摆脱种种无谓的权争与恶斗、培养具备悲悯之心的“政治情怀”、积极推动民间的和解运动，以及为两岸建构一个可以分享或合作的未来等。

〔关键词〕台湾政治 民粹主义 情绪化 国家认同 两岸关系

〔作者简介〕沈惠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民粹主义是台湾政治的基本特征，或者称之为民粹政治。^{〔1〕}事实上，所谓民粹主义是“少数精英打着社会平等及争取自由或国家独立等理想，诉诸人民的感情与群众心理”，^{〔2〕}其背后是情绪在起作用，或者说民粹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情绪，民粹化毕竟是一定的社会情绪的反映。因此本文主张情绪化是台湾政治的主要特征，或曰情绪化的台湾政治。下面将探讨情绪化的台湾政治之基本意涵、表现与成因、影响及应对之道等，以求教于方家。

一、情绪化政治的内涵

情绪化的台湾政治或台湾的情绪化政治，其基本意涵主要由三方面构成。

* 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批准号：16JJDGAT003）的阶段性成果。

〔1〕 参见周阳山：《民粹台湾》，台湾：时英出版社2004年版；郭中军：《台湾地区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1987—2008》，上海：学林出版社2014年版；杨剑：《领袖心理、公众情绪和敌意的社会习得》，《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4期。

〔2〕 彭怀恩：《认识台湾——台湾政治变迁五十年》，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首先，台湾政治人物表现情绪化。在台湾的选举中，政治人物往往使用情绪化修辞如“包装糖衣的隐性负面族群语言”来动员群众、获取选票。台湾学者李广均曾将“引发族群间紧张焦虑的负面语言”区分为沙文主义式、集体动员式、标签式、代罪羔羊式四大类。“沙文主义式语言包括‘番仔’、‘台客’、‘大陆妹’等，强调自我优越感；集体动员式包括‘客家人支持客家人’等，强化‘我们’一体，用族群动员，被批为‘情绪政治’。标签式包括‘中国琴’、‘外省猪’等，属短线政治操作；代罪羔羊式最经典莫过于‘外籍配偶应少生一点’，透过强力贴标签，把复杂公共议题简化成少数团体的罪恶，以模糊焦点。”^{〔1〕}换言之，政治人物只看到眼前利益、过度算计选票，常常炒作充满情绪及议题张力的题材，并借助谎言、偏见等负面选举手段煽动支持者的热情以便获得选票；却不愿从台湾整体发展的角度，理性思辨攸关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环保、劳工、社会福利等重大议题，任由民粹和政治考量决定政策走向，从而给台湾社会带来巨大伤害。针对于此，台湾学者蔡逸儒曾揭露道：“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政客不过都是些鱼肉百姓的机会主义分子罢了，所谓的理想、气节，不过是些骗人的玩意，千万当真不得。”^{〔2〕}

其次，台湾民众容易情绪化。当今世界，事实的传播已明显让位于情感的传播，人们能够及时体验到各种政治情感所带来的冲突，也更容易受到情绪的蒙蔽和主导。以台湾为例，普通民众往往心浮气躁、容易情绪化。尤其是民众的年龄愈长、教育程度愈低，也因其政治态度愈稳固，或较倾向情绪性的政治思考，以致有显著偏高的政治极化结果。而一次次的选战，不仅激荡着不同信仰的选民的危机感，也升高了他们的对峙情绪。在当前台湾岛内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逐渐累积的情况下，社会中充斥着对立、仇恨的情绪。难怪有人认为，台湾人比的不是智商或情商，而是情绪爆发的能力。“不同立场、不同意见的人都在‘求爽’……在这求爽的过程中，大家不断地宣泄自己的情绪来堆高对方的情绪，逼得对方必须以更大的动作来宣泄自己的情绪，然后呢？自己又得以更超过的情绪来响应对方升高的情绪。于是情绪永远宣泄不完，反而愈泄堆愈多，在这一场求爽大赛里，没有人是赢家，台湾成了所罗门王前被两个母亲争分的婴儿。”^{〔3〕}台湾民众容易情绪化的一个重要案例，就是2014年底“九合一”选举中台湾民众的情绪化投票让民进党意外大胜。台湾民众的情绪化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台湾政治舞台非常情绪化。一直以来，台湾地区的政治舞台上充满着政治情绪与情感诉求，使得朝野或蓝绿“两边的无休争吵与议论，但似乎谁都没理没听另一方说了什么。情绪或被情绪地驾凌一切行动与话语”^{〔4〕}。可以说，在台湾政治舞台上“政党相互谩骂不休”，一个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立法院”，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朝野“立委”登台作秀与相互杯葛。而政治人物为了获得选举胜

〔1〕《台湾情绪政治：“入联”冲上负面语言排行榜》，http://news.ifeng.com/taiwan/1/detail_2007_11/05/1037302_0.shtml，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2〕蔡逸儒：《台湾：不正常社会的不正常现象？》，<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cai-yi-ru/story20100123-55879>，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3〕《系统失灵、民主失灵、台湾失灵》，<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0823005688-262101>，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4〕吴新慧：《情绪至上的理由》，<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71008-801313>，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利，往往不择手段，不顾后果地提出讨好民众的公共政策或社会福利，甚至刻意进行族群动员，从而造成族群间的敌视与认同上的混乱和不安。争取选票的诱因，导致台湾政治舞台堕落为情绪化的民粹表演。有学者形容，台湾选举已经变成一种“时间一到，大家齐来疯”的政治游戏，“为了吸引选民的眼球，纵使十分荒唐和超越伦理道德范畴的事情和话也有人做、也有人说”〔1〕。一句话，台湾从开始举办民主选举、实现“议会”民主时就比较情绪化，政治人物在竞选活动中或政坛上情绪化的政治表现，透过媒体与民众的情绪融合在一起，导致整个政治舞台极其情绪化。

综上所述，由于台湾的民主化是高层政治精英角逐权力、而非由下至上的政治参与所形成的产物，因此这种民主很容易异化成为政治人物利用大众的情绪，变成政治斗争、遂行政治夺权的工具。以2014年“反服贸运动”为例，这场披着“纯洁学运”外衣作掩饰的学潮充满了政治算计，“政客为攫取个人利益，不惜典当台湾的未来，无视台湾经济被边缘化的事实，只求煽动‘仇中反马’氛围，以阻碍执政党任何有利政绩的决策……过去矫饰而造作的‘民主’，经过暴力学生的折腾、揉捏，如今益发显得狰狞不堪，假面的内在充满了猜忌和权谋，包藏祸心的政客只等着选举到来时收割成果”〔2〕。当前台湾社会存在着不健康的政党政治和社会氛围，尤其是“街头政治”频繁上演，这与真正的民主是背道而驰的。“‘街头政治’容易诉诸激情与暴力，不利于和平理性协商。‘街头政治’中，本该是严肃探讨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议题，往往都被简化为一条条标语和口号，有时甚至被‘升华’为‘抒情’和‘道德拷问’，这使得‘理性’几乎没有立锥之地。”〔3〕由此可见，情绪化的台湾政治中长期充满仇恨语言，也充满伪正义腔调的暴力。这不仅不断恶化台湾的政治生态，也不断毒化台湾的社会和民主发展。在面对全球激烈的竞争与经济动能丧失之际，台湾社会不但无法累积正面向上的能量，反而更加对立，也迷失发展的方向。

二、情绪化政治的表现与成因

情绪化的台湾政治主要表现有如下三方面。

首先，政治舞台上的政党恶斗。民主政治的要义在于，各方和平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并通过民主程序即经过论争、交流和沟通，达成共识来形成代表多数人的价值选择。但台湾的民主制度像是个残疾人，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政党恶斗，政党之间不讲是非对错标准，却按照族群、统“独”、蓝绿颜色等来做区隔，常常使用“仇恨语言”去凝聚内部的共同身份感并建构、刺激外部群体和“他者”，导致台湾政治舞台陷于长期的蓝绿对立与两极分化，“对手（敌人）赞成的我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就赞成”，大家为了短期、个人、政党的政治利益，可以置民众及社会整体利益于不顾。“蓝绿双方支持者只有立场，对‘是与非’采取‘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态度，而政治人物长于刺激大众的情感

〔1〕 李立：《台湾政党政治发展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2〕 陈晔哲：《从周星驰电影的“无厘头”看台湾民主的诡变》，<https://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40419-334151>，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3〕 陈婧：《“街头政治”是一剂有毒的猛药》，<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509/c40531-24995631.html>，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宣泄，善于政治悲情的演练，使得很多议题，往往一出现就陷入蓝绿‘爱台—卖台’口水战中，而混淆、泯灭议题本身的理性说理与讨论空间；目的只是为了巩固、凝聚支持者的拥立情绪，激起对方的对立情绪。”〔1〕可以说，台湾社会最不缺的，就是极端意识形态的对立。加上高政治参与意愿、低政治参与水平的网络世代崛起等因素，台湾政治出现诸多病征，严重影响了台湾的发展与进步。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曾就此感叹道，“台湾这个社会真的被蓝绿绑架，要在两极对抗的社会当中维持平衡往前走还真的蛮辛苦的”。

其次，台湾选民的情绪化对立。当民主只剩下投票，政治只剩下选举，那么，所谓的民主政治就被掏空到只剩一副皮囊了。不幸的是，今天台湾的情况已经差不多走到了这个地步：朝野政党只在乎自己能不能取得政权，不在乎自己能留下什么政绩；政治人物心心念念只有作战策略，终日算计对手，不在乎能为民众解决什么经社大计。“更可怜的是社会大众，一次次跟随蓝绿的魔棒起舞，对不同阵营的同胞充满了怨怒和仇恨，却未意识到自己变成了政客的玩物，亦未意识到台湾已逐渐被撕裂成互不相容的两半了。”〔2〕台湾的病态选举风气导致的“选举症候群”，不仅严重危害了生命个体的身心健康，癫狂政治介入家庭与校园还使“选举病毒”感染了社会肌体的重要组织系统。“长期以来，政情纷扰与激情失控，普通民众因为政治选择与好友翻脸、家庭失和、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的事层出不穷，甚至蔓延到一些校园间，一些教师动辄在课堂上抒发己见，随特定政治人物的选举语言起舞。”〔3〕简言之，台湾政治已无力回归“治理”的主轴、只剩下“选战”的驱动，导致选举议题变为一种感情化的发泄，或者变成一个口水战骂来骂去。“在蓝绿对立、新媒体、网络新社群崛起的情况下，台湾政治社会在面对内部的重大歧见时，缺乏讨论思辨的时间与空间，更缺乏耐心与包容，‘党派斗争’、‘为反而反’成为主导情绪，使得问题治丝益棼，社会人心也呈现认知破碎，无法存异求同，凝聚共识。”〔4〕另一方面，选民的健忘、情绪化、或容易被煽惑，致使其沦为一个个任人摆布的棋子，不知道自己将被置于何方，更遑论阻止台湾迷途的命运。

最后，整体社会的集体焦虑症。一旦进入选举季，台湾社会就周期性地陷入“政治癫狂期”。政治人物对政权、权力的疯狂争夺无所不用其极，呈现出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状态，以极端手段和“以轰炸式的文宣战术刻意切割民意板块”，“造成社会族群因剧烈的撕裂而产生集体性的情绪紧张，甚至是焦虑、躁郁……而在社会强烈对立低气压下，部分民众因情绪失控，采取自戕行为的危险性骤然升高。除了自杀之外，还有不少人因选举情绪过激而做出极端行为”。〔5〕近年来“公民运动”成为潮流，“公

〔1〕王茹：《台湾建构公民社会的“协商民主”之实践状况——以“选票民主”的反思为背景》，《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1期，第3页。

〔2〕《当民主只剩下投票 政治只剩下选举》，http://m.haiwainet.cn/middle/232620/2015/0609/content_28815867_1.html，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3〕《台湾选举年的精神病问题：癫狂侵入家庭与校园》，http://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7-08/24/content_6590556.htm，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4〕《台湾政治的几大病症》，http://www.taiwan.cn/plzhx/hxshp/201412/t20141216_8376937.htm，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5〕《台湾选举年的精神病问题：癫狂侵入家庭与校园》，http://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7-08/24/content_6590556.htm，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民参与”成为显学，但是在这些华丽辞藻的背后，并非民主的深化与巩固，“而是社会集体躁郁症的爆发，呈现的是反抗的浅薄化、情绪化与自我感觉良好，‘只要我觉得对，有什么不可以’成为主流。台湾引以为傲的‘最美风景是人’，全然崩裂”。^{〔1〕}换言之，在台湾政治局势紊乱无出路的同时，经济停滞、薪资倒退、生活的幸福感与安全感被剥夺，加深了人们的无力感与不确定感，整个社会处于集体郁闷、集体焦躁的情绪之中。“毕业起薪只有所谓的‘22K’，青年失业、贫富差距加大更是加重了台湾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对未来的焦虑。特别是随着大陆的实力愈来愈强大，台湾的力量则相对而言越来越衰弱，台湾在两岸多元、互动中自主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小。这种基于主动选择机会缩小而发展起来的反弹意识在网络中被人放大后，也容易造成情绪激化反应。”^{〔2〕}

深究起来，三大因素造成情绪化的台湾政治。

首先，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上的严重分歧与对立。台湾学者李丁赞认为，台湾的民主进程是镶嵌在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中。而这种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裂与对立，一方面往内发展，又镶嵌在本省/外省的族群政治之中，进而镶嵌在蓝绿的社会关系之中；往外则镶嵌在大陆与台湾的分立格局之中。^{〔3〕}朱云汉进一步指出，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上的两极化对立诱发政党领导人物的不愿共同维护与遵守政党竞争伦理与民主竞争基本规范。“在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愿景（统‘独’）形成岛内水火不容的两条政治路线，也形成两边追随群众间相互的猜疑与敌视。在统‘独’光谱上两端的政治势力，彼此间已不存在起码的宽容、信任或尊重；对立情绪已经凌驾对民主程序的基本共识，所有的诋毁、丑化与打压手段都可以被合理化。”^{〔4〕}“国家认同”的极端对立导致台湾社会缺乏宽容、妥协与合作精神，没法透过理性辩论来制定公共政策。其结果是，台湾朝野、蓝绿等面对不同的意见或信仰，往往诉诸情绪性的语言相互对骂、指责，或是透过动员向对方示威等。2016年“洪素珠事件”再次证实台湾仍旧停留在一股新形态下的省籍、统“独”的意识形态拉锯战中。

其次，台湾社会缺乏民主政治所必备的“公民文化”与素养。简单地说，台湾社会以情感为本位的文化特征决定了选举的去理性化与去个人化特点，因此在台湾地区的选举中，以情感动员超越政策动员的情况比比皆是。这种情况基本上反映出了台湾社会对民主选举政策理性共识的缺乏。^{〔5〕}加上台湾的民主尚未深化，“各种社会关系仍充满权威，平等、互动、亲密的教育环境不能诞生，人文教育无法开展，人文质量也无法提升，民主参与过程中所必备的‘公民’能力与‘公民’德行都没有养成，包括基本的政治判断力与伦理思维能力都缺乏，难怪‘公民’会被政客绑架，变成政客动员的工具。这是台湾政治无法理性化的因素”。换言之，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台湾长期处于威权文化下，并未

〔1〕《台湾政治的几大病症》，http://www.taiwan.cn/plzhx/hxshp/201412/t20141216_8376937.htm，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2〕肖杨：《从“九合一”选举看台湾社会的情绪化投票》，（香港）《中国评论》2015年第3期。

〔3〕李丁赞：《民主社会如何可能？二十年台湾经验的反省》，（台湾）《思想》第11辑：《民主社会如何可能》，台北：联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38页。

〔4〕朱云汉：《国民党与台湾民主转型》，载朱云汉等：《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页。

〔5〕陈星：《台湾民主化与政治变迁——政治衰退理论的视角》，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培养出民主政体所需的“公民文化”，导致一般民众对公共领域的事务尚缺乏理性参与的习惯。其结果是，台湾的政治文化偏重于对抗，政治悲情被滥用，致使“恨的政治学”、“表演政治学”、“市场式民主”大行其道。因为理性沟通与对话的欠缺，“一些很重要的人文素养，如宽容、多元、开放等，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而且，也因为沟通对话没有启动，一些基本的民主能力，如政治判断、伦理论证、逻辑思考等，也很难发展。……只能相互丑化或进行无止境的对抗、厮杀”〔1〕。

最后，台湾“选举社会”无止境的竞选活动。美国学者艾米·戈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认为，竞选活动将破坏国家治理所需的妥协精神。“妥协的理念的表现是我们所谓的有原则的审慎（适应形势调整原则）以及互信尊重。与之相反，不容妥协的理念则显露出有原则的固执（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彼此不信任（怀疑对手）。”〔2〕台湾岛内无休止的选举、选举竞争的战线无限延伸、无止境的政治动员，致使整个社会普遍缺乏亲密经验与相互尊重，“彼此不给予对手的政治权利与社会代表的正当性最起码的尊重，在选举竞争中，经常看到政治人物向政治对手施加毁灭性人身攻击，操弄撕裂性与歧视性的政治图谋”。“这个裂痕更因为部分政治人物在选举动员时反复的煽动与挑拨而难以愈合。每选举一次心理裂痕就扩大一次，更增加选后社会整合与政治协商的困难。其结果是，朝野政党间的互动模式已经超脱民主体制下的理性竞争，而近乎一场惨烈的政治斗争。”〔3〕可以说，“选票民主”在台湾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选举的热烈、激烈、疯狂及对立程度是独一无二的，选举已经成为一种“零和”的游戏。“辛辣的言词、挑逗的情绪、非蓝即绿的立场、贿声贿影的歪风，台湾地区的选举浸淫太多统‘独’的氛围，没人奢望‘零和’选风会有改弦易辙之日。”〔4〕情绪化的选举与政党竞争将社会矛盾、社会分歧对立化、冲突化与极端化，不仅在重大的价值与政治问题上，而且在很多社会议题上，也无法达成共识，导致台湾政治陷入“空转、沉沦、劣币驱逐良币”的境况，即在容易被民粹话题鼓动、受政党派系利益牵制的政治环境中，“选贤与能”的重要性逐渐被削弱，最终陷入形同“民主内战”的困境而无法自拔。

综上所述，台湾政治发展已进入瓶颈期，民主政治虽带来言论和思想的解放，却未使政治内涵和品质得到相对的提升。妥协是民主的政治艺术，“没有妥协就没有宽恕，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亦即民主的一个精髓在于政治妥协。在没有妥协文化的情况下，民主出现“吊诡”，民主的结果往往是“反民主”。其结果是，不宽容不妥协的蓝绿对抗、充满不信任的政治环境使社会共识变得难以凝聚，台湾选举的热烈、激烈及对立导致整个社会无法走出朝野相互仇恨、南北彼此不满的困境。除此以外，使情况更糟的是，部分媒体未能善尽言责，反而使民众情绪激发几乎到达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蓝绿、统独’意识所大力切割而政治立场过于鲜明，报道政治新闻和讨论政治议题时通常采取非蓝即绿、

〔1〕 李丁赞：《台湾民主困境的社会根源》，《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7年3月第65期，第219页。

〔2〕 [美] 艾米·戈特曼、丹尼斯·汤普森：《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破坏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3〕 朱云汉：《国民党与台湾民主转型》，第217—218页。

〔4〕 郭中军：《台湾地区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1987—2008》，上海：学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09页。

党同伐异的态度，偏爱激情的口水战而无细致说理的政策讨论”^{〔1〕}，这又造就了一大批愤世嫉俗、理盲滥情的民众，致使整个社会情绪化严重。

三、情绪化政治的影响及出路

情绪化的台湾政治造成以下四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首先，情绪化政治导致台湾岛内的政治激进化。在台湾，背离妥协精神的分权制衡容易扭曲为恶性政争，成为激化社会对立、制造分裂的源头，抑制政府决策能力并错失改革良机。“民主赖以维系的政党政治走到今天，不仅劣币驱逐良币，甚而无才可觅，难以为继。更可怕的是，台湾实施直接民选20年，理想丧失，人性涂炭，让人不得不问，除了选举，除了仇恨，还剩下什么？”^{〔2〕}另一方面，“国家认同”与政治社群想象上的分歧变成台湾内部最具有破坏性、撕裂性的矛盾，这个尖锐的矛盾阻断社会共识、消耗内部精力与诱发政治激进化。由此可见，台湾社会充满斗争与仇恨之风气，这已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造成侵扰和压迫。“由于热衷于意识形态，台湾社会陷于极大的动荡之中。安全感的丧失，使得外来及本地投资者却步，经济发展逐步萎缩，呈现停滞状态。过往十余年经济社会发展止步不前的恶果，至今还在影响着台湾社会。”^{〔3〕}概言之，在情绪化政治下，台湾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高度地政治化，出现泛政治化现象。不仅如此，在非此即彼、敌我分明的对立思维作用下，台湾岛内政治逐渐激进化。

其次，情绪化政治导致台湾社会民粹化。人们普遍认为，台湾社会存在“民粹”与“对立”这两大“肿瘤”。台湾民主化后，因为政治文化没有相对提升，加上群族矛盾及蓝绿、朝野恶斗，造成社会意识形态严重分歧与对立，导致民主政治日趋民粹化。“民主化的结果使台湾社会进入一个从未经历的政党政治时代；政党政治的要害在于争取选民、争夺选票，为此不惜任何手段。这就导致了一切以民意依归，在不良政党和政客的操弄下，不可避免地出现民粹化浪潮。民粹化的政治体制不但更专注于利益分配，专注于短期效应；且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推动产生严重阻碍，大大恶化了台湾原本顺畅的行政与立法关系及效率。”^{〔4〕}近些年来，在台湾岛内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议题，一直在上演着同一种问政剧目并产生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近期台湾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已经超出了正常社会伦理所能理解的范畴。这种政治逆反现象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孤立的案例，而正在成为台湾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些蜂拥而出的现象同时又把整个台湾的社会政治情绪带向偏执，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台湾的民主乃变形山寨版的民主，只见激情吵杂不见真民意的民粹。

再次，情绪化政治终将导致台湾自我解体。情绪化容易导致“愤怒政治”，这是对于失落、失望的

〔1〕 王茹：《台湾建构公民社会的“协商民主”之实践状况——以“选票民主”的反思为背景》，《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1期，第4页。

〔2〕 《台湾〈中国时报〉：政党政治衰败到只剩选举与仇恨》，http://news.xinhuanet.com/tw/2014-11/14/c_127211072.htm，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3〕 《走中道路线：台湾需要追回流失的时光》，（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第7期，社论。

〔4〕 周建闽：《台湾边缘化的由来与破解之道》，（香港）《中国评论》2018年第4期。

心理反应。而“愤怒政治”所伴随的情绪至上言行，最终让社会裂痕不断扩大而崩溃。有人担忧，台湾各个政党如果还沉溺在权力的斗争当中，并让整个社会处在统“独”、阶级或蓝绿之间矛盾的困境中，终将导致政权内部开始瓦解；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基本共识和价值，台湾民众就会开始对一切无感，最后就会落得崩解的下场。换言之，当台湾民主异化为民粹，整个社会的裂痕不断扩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困顿之中，台湾社会将陷入自我浩劫。“狭隘心胸、嗔心反应、根除异己，对台湾毫无益处。当嗔恨之心形成言语或付诸于行动时，理智不见了，道德不见了，甚至法律也不见了。有嗔心的人，让他人不舒服；有嗔心的政府，让人民遭殃；有嗔心的媒体，让人恐惧；有嗔心的社会，必然是理盲、缺少道德与价值信念的社会。这种社会不会有未来，只会自我毁灭，台湾人民多年胼手胝足的成果必会毁于嗔心。”^{〔1〕}一句话，如果台湾朝野、政党、民众仍在族群对立及统“独”纠葛中内耗下去，台湾将面对不断边缘化甚至逐渐衰亡的命运，其远景实在不能让人乐观。

最后，情绪化政治有可能导致两岸的情绪对立甚至对抗。台湾的情绪化政治严重制约着台湾的治理绩效和民主政治的巩固，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了更多的变数。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使得各个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不公平。就台湾而言，在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逐渐累积的情况下，社会中充斥着对立、仇恨的情绪。另一方面，对台湾来说，无论区域化还是全球化，中国大陆都是绕不过去的主体。“这种情形使得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对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产生疑虑和反感。反映到台湾年轻人的政治认同上，便是台湾本地认同的强化，和对中国大陆（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象征）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很显然反映在被称为‘太阳花运动’的反服务贸易运动中。”^{〔2〕}这场运动是台湾政治民粹化的高峰，其核心动力是政治人物鼓动起来的“恐中”与“反中”情绪。比经济层面影响更深远的则是两岸民间情感的裂痕。“太阳花学运在台湾煽起反中情绪，也对应地撩起了大陆民众的情绪，过去大陆民众称颂的‘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现在网路上，对台湾社会不友善的言论声量已压过了友善的声音。”^{〔3〕}这种情形不能不令人担忧，伴随两岸交流交往在各领域、各方面的密集交叉，两岸民众间发生矛盾的机会必将增多，其中任何一个微小的摩擦都有可能成为两岸集体情绪对撞的导火索，最终导致两岸直接的冲突。

综上所述，当前台湾社会在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外衣下，却允许各种谩骂、仇视和奚落凌驾于合理的公共讨论之上。这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不安和对立的氛围，不但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公平正义价值被摧毁殆尽，连带着社会和谐的稳定根基都可能被侵蚀。不仅如此，台湾岛内“情绪化政治”还不幸地外溢到两岸关系中。近年来台湾社会因政经矛盾等而累积的内部怨恨情绪，很容易转化成外部怨恨情绪，亦即把怨恨的对象导向中国大陆，致使部分台湾民众的“反中”情绪持续高涨，最终集

〔1〕《“根除异己”仇恨心会毁了台湾》，<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0201002256-262101>，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2〕郑永年：《习马会与两岸关系的未来》，<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51110-547342>，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3〕《面对太阳花肆虐后的现状与未来》，<http://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70319000408-260109>，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中爆发于“反服贸”运动之中。

面对“情绪化政治”在台湾造成的诸多弊病，人们不但怀疑“一个建立在仇恨煽动上的政治，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吗？”，也在不停地追问“台湾如何在相互尊重与容忍的基础上建立起有厚度的民主？”或“台湾的民主政治何时才能达到温和、理性的理想呢？”，亦即如何使台湾政治“正常化”，摆脱“情绪化政治”的绑架，使民众不再生活在劣质化的政治风气甚至政治仇恨之下。

首先，台湾社会欲避免走向没落，必须摆脱种种无谓的权争与恶斗。台湾学者张亚中认为，一种带着仇恨的“分别心”正在侵蚀台湾的社会，它让台湾社会忘掉了什么是“尊重”，什么是“包容”，什么是“慈悲”。亦即仇恨的种子已在台湾开花结果，这会毁了台湾；“权力决定是非”的阴霾已笼罩台湾的天空，这会让台湾迷失。^[1] 易言之，2016年民进党再次执政后，以“转型正义”为由，用多数暴力来“合法”处决中国国民党、撕裂不同历史记忆之群体间和平相处的机会，致使仇恨之火在民间不断高涨，产生“你斩我的偶像，我砍你的神像”的报复情绪，导致台湾族群仇恨已到爆发临界点。针对于此，江宜桦建议台湾民主必须开展“1.0 转化为 2.0”的升级进化，告别民粹与政党恶斗的劣境，构建“讲道理”的政治文化和生态。所谓“讲道理”的政治文化和生态是针对这种不健康的政党政治与社会氛围而言的，它要求人们从个人与人性的角度出发，透过包容乃至相互理解去消解政治类的宏大叙事，不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推动社会各个领域民主对话习惯的养成，从各个细节方面培育出健全的公民文化，厚植民主政治的社会资本，促进民众政治参与的品质，从而反制、抵消、化解台湾自政治转型以来‘选票民主’、对抗性政治文化的弊端。”^[2]

其次，培养真正关怀台湾民众处境、台湾自然生态的“政治情怀”，不做一个只是个充满情绪化的政治动物。当前，深受非理性情绪驱动的台湾社会正在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政治现象，亟需民众树立抱持慈悲、包容与理解之心的“政治情怀”。“伸而论之，你对任何政治事件，总是多观察而少浮言，万一不得而言者，也绝对不滥言；你绝对不会把任何和政治不相关的议题无限上纲化；你自律甚严，知者为知之，不知就坦诚自己真的无知，绝不以浮夸而傲人；你赞成改革，但深知改革不单是政府之责，一定得从自身要求起；你只能是改革理念的引导者，绝不人云亦云，因为一时民意的走向往往是过眼浮云，你不能媚俗，拒绝政治正确论，你绝对不满足只是当个过往理念的‘镰刀派’。上述这些，我们只要能做到其中一条，自然就会从自己的内心升起‘政治情怀’。”^[3] 此外，通过培养民众对制度的尊重、对法治的尊重、对专业正义的尊重，将有助于破除台湾社会的非理性氛围，从而有助于扭转台湾社会政治生态的非理性化趋势。

再次，积极推动民间的和解运动，引导出全社会一种和解的文化。面对情绪化的台湾政治中长期

[1] 张亚中：《仇恨会毁了台湾》，<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725000369-260109>，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2] 王茹：《台湾建构公民社会的“协商民主”之实践状况——以“选票民主”的反思为背景》，《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1期，第3页。

[3] 银正雄：《台湾民主欠缺政治情怀》，http://news.ifeng.com/taiwan/4/detail_2013_05/31/25937233_0.shtml，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充满仇恨语言及伪正义腔调的暴力，台湾岛内一部分公民社会组织已经产生出一种自觉的意识，即要通过推动社会内部各种关系的民主化，促使活跃的、强大的、参与性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扩大社会的自主领域，来促进政治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不仅仅把目光局限在选举政治及政治民主化的各种制度建设上。早在2004年底，鉴于“省籍一族群”冲突、蓝绿冲突造成的伤害已经危及台湾社会的稳定，“时报文教基金会”、“台湾促进和平文教基金”等民间社团成立“族群和平工作坊”，举办“面对族群与未来——来自民间的对话”座谈活动，积极推动台湾各族群的和解行动，试图“在各个族群之间开启了理解之门，对历史的伤痛和现实的政治撕扯有所疗治”。这是台湾民间社会组织积极推动社会和解的一种努力。“他们的实践已经不仅仅是在书斋、校园或自己社团圈子里去传播理念，展开互动，而且具有一种目光向下的，深入于草根、基层的自觉，通过许多类似这样的活动，他们期望台湾社会的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能够相互促进。”^{〔1〕}当前台湾社会正在推行所谓的“转型正义”，但却没有找到治愈伤口的良药，导致撕开历史的疮疤后，社会更加对立，因而似乎离和解之路越来越遥远。针对于此，我们期待岛内各个族群、各个阶层能够放下彼此的成见与偏执，做好共同勾画未来的准备，透过和解运动引导出台湾社会的和解文化。

最后，两岸之间应认真思考如何处理双方的分歧与差异、如何促进相互理解与信任。两岸民众由于成长背景、生活方式、集体记忆、政治文化等都有相当大的不同，因此难免存在着误解，造成沟通上的困难。这些年来，两岸之间相当多的交流领域，虽然提倡建立互信，但论争、辩驳、强求对方接受己方观点乃至斗争的心态仍然很浓厚。两岸民意的落差及由此可能增加两岸对峙危机的严重性，迫切要求我们思考如何处理双方的分歧与差异，如何更有效地促进两岸民众的心灵契合。以往我们习惯于以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来衡量政治，当出现政治事件时第一反应是从经济上找答案。“我们认为只要把台湾经济绑定在大陆经济的战车上，台湾就跑不了。政治固然离不开经济，经济在很多时候也决定着政治。但政治并不仅是被作用的，政治有反作用，有时还有着决定性作用。政治有其自主性，政治中的情感因素很多时候不是经济因素所能比拟的。”^{〔2〕}有鉴于此，为了避免最坏情况的出现，两岸从政府高层到民间互动，都需要更为深刻的理解与倾听，如龙应台所言，“归根到底，两岸的人民需要开启大倾听的时代”。概言之，当前两岸民众之间迫切需要本着“仇必和而解”的态度进行和解工程，为两岸建构一个可以分享或合作的未来。“从两岸民众的个体层次上来说，都需要有一种反省与反思的态度，必须摆脱‘我们/他们’相互对立的分类心态，必须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达致相互理解，在两岸交流的各个领域共同发展出可以进行深入对话的空间。”^{〔3〕}

〔1〕 王茹：《台湾民间的“省籍一族群”和解运动——以〈面对族群与未来——来自民间的对话〉为例》，《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3期，第51页。

〔2〕 杨光斌：《港台政治进入后物质主义时代》，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4-12/5227894.html，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3〕 王茹：《台湾民间的“省籍一族群”和解运动——以〈面对族群与未来——来自民间的对话〉为例》，《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3期，第53页。

四、结 语

情绪化的台湾政治已经导致岛内民众产生诸多不安，诸多不良的政治人物还在不断残酷地撩拨他们的焦虑，分化他们的认同和情感，加深他们的对立和撕裂。从政论节目言论分殊的定型化，从餐厅、企业被贴上蓝绿标签，从专家学者因立场歧异而无法再同台交流，台湾社会的“决裂现象”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当前执政的民进党当局推行所谓的“转型正义”只会将台湾社会推向族群更加对立、民粹化更加盛行的深渊，只会助长社会撕裂、冲突甚至仇恨。可以想象，台湾最终的境况只会越来越糟，愈来愈像“困境内的旧人类”，而不是越来越好。因此，如果不解决台湾“民主的困境、系统失灵的困境，每一次情绪上的‘今天爽过’，都只是一步步把台湾推向‘明天过后’（的末日景象）”^{〔1〕}。当前，深受非理性情绪驱动的台湾政治不但对台湾政局、台湾社会经济的未来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并将使未来的两岸关系受到巨大冲击，甚至可能导致两岸之间爆发直接的冲突。有鉴于此，人们应该开始认真思考如何超越“情绪化政治”的窠臼，以悲悯之心消弭朝野、蓝绿、族群、阶级甚至世代的情绪对立，在相互尊重与宽容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解，让台湾的政治和社会逐渐重新回归理性之路，并在“两岸同属一中”的前提下探讨实现台湾与大陆的完全统一。唯此台湾地区才可能有光明的前景。

（责任编辑：张笑天）

Emotional Politics of Taiwan and Its Implications

Shen Huiping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populism is the basic feature of Taiwan's politics. Actually, it is emotion that works behind populism. Populism itself is a kind of emotion, or a reflection of certain social emotion. Therefore, emotionalization is the main feature of Taiwan's politics. In other words, Taiwan's politics is emotional. Firstly, the emotional aspects of Taiwan's politics manifest in three ways: in the respective emotionalization of Taiwan's political stage, in its politicians and in its ordinary people. Secondly, Taiwan's emotional politic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ierce discord between the political parties on the political stage, in the emotional opposition of Taiwan voters and the collective anxiety of the whole society. Actually, this emotionalization is caused by three major factors, namely, the dramatic differences and opposi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s society, the lack of "civic culture" and quality necessary for democratic politics in society, and the endless political campaigns in Taiwan as an "electoral society". Finally, emotionalization will result in the radicalization of Taiwan's

〔1〕《系统失灵、民主失灵、台湾失灵》，<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0823005688-262101>，最后检索时间：2019年7月1日。

politics, the populism of Taiwan's society, or eve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aiwan, as well as the emotional antagonism or even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Straits. The solutions to Taiwan's emotional politics include getting rid of all kinds of meaningless power struggles and vicious fights, cultivating "political feelings" with compassion, vigorously promoting nongovernmental movements of reconciliation and constructing a shareable future in which people across the Straits can collaborate together.

Keywords: Taiwan politics, populism, emotion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cross—Strait relations

Author: Shen Huip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octor at Graduate Institute for Taiw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